

穆巴拉克政权 应对国内恐怖主义之策

杨灏城

内容提要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埃及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穆巴拉克政权采取标本兼治的方针：区别对待穆斯林兄弟会和极端势力；动员社会舆论，批驳极端思想；致力于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杜绝隐患，弘扬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1997 年起国内安全局势转危为安，处于相对平静时期。这两年发生的几起孤立的、以团伙作案的爆炸事件说明：国内的极端思想尚未肃清。这种恐怖活动很有可能演变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恐怖主义，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发展成上世纪最后 1/4 世纪那样规模大、频率高、打击面广的恐怖主义。

关键词 埃及 穆巴拉克政权 恐怖主义 对策

作者简介 杨灏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5）。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在形形色色伊斯兰思潮的推动下，加之萨达特总统推行的错误的宗教政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再度崛起，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数以十计的极端组织相继出现¹，1974~ 1997 年，频频制造恐怖活动，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尔后，埃及国内的安全形势转危为安，恐怖活动基本平息。人们不禁要问，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正当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之际，为何埃及却进入了相对平静时期？毋庸置疑，这首先应归功于穆巴拉克政府采取的正确对策。

区别对待，分化瓦解

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有温和派和极端派之分。前者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后者以伊斯兰集团和圣战集团等极端组织为主。二者在斗争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憧憬的最终目标上别无二致，都企图取代或颠覆现存的世俗政权，代之以经、训为基础的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这两股势力对埃及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政府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出发，制定了不同对策。

极端组织均系本国极端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的忠实信徒。它们把他所著的《路标》一书奉为分析当今社会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库特卜在书中对经、训做了蛊惑人心的诠释，在统治权和膜拜权归真主的名义下，诡称任何政党和凡人都不得自行立法，必须回到真主为人类现世和来世生活所制定一切的伊斯兰教法中去；现世各个社会，包括伊斯兰社会在内，因褫夺了真主在人间的统治权，擅自立法，而属于“蒙昧主义社会”。库特卜力主圣战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要求他们从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出发，先发制人，“用实力和圣战去废弃统治制度和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权力机构”^④。

¹ 关于这些组织的概况，参阅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和世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57~ 368 页。

^④ 赛义德·库特卜：《路标》，开罗 1993 年版，第 64 页。

极端组织以这些信条为主臬，宣称包括埃及在内的现政权都是叛教政权；圣战矛头由近及远，先指向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继而向帝国主义宣战。一些极端组织把库特卜思想进一步推向极端，胡说什么国家是叛教者，整个社会，不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是叛教者，对他们的惩处是夫妻离异，杀死本人。它们借口“触犯教法，即便愚昧无知，亦不能原宥”，“允许用暴力改变人们的恶行”，将基督徒、苏非派乃至一般穆斯林视为斗争对象，甚至荒谬地提出掠夺基督徒和本集团之外穆斯林的财产是合法的。这些组织策划了无数次恐怖事件，上至总统、议长、总理，下至普通军警、作家和学者，都成了它们追杀和劫持的对象，而且发动武装暴乱，进攻保安部队营地、警察局和监狱，袭击外国游客，危及科普特人的生命财产，捣毁酒吧、夜总会、影院和录像厅，冲击学校举办的联谊会、毕业生晚会和音乐会，破坏苏非派参拜圣陵和纪念圣人的宗教礼仪。

可见，这些极端组织策划的暴力事件不是带有一般政治色彩的孤立、偶然的恐怖事件，而是有组织、受特殊意识形态驱使和梦想以暴力手段实现既定政治目标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以宗教为名，其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与合法性的标准通常有别于世俗恐怖主义。后者在实施恐怖活动时，有时会受政治、道德等因素的掣肘和抑制；前者则不然，自诩为神的“真正信徒”，对异己施暴是“替天行道”，故而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它的打击面更广，手段更凶残，危害更大。

面对如此凶恶的极端组织，埃及政府无法通过政治制度化将它们吸纳到正常的政治渠道进行对话和沟通，只能动用国家机器镇压之。它指令内政部牵头，与保安部队和警察总署协同作战，并组建反恐部队和旅游警察部队。先后在 1981 年、1992 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法和反恐法为反恐行动提供了便利与法律保障。情报机构深入敌人内部，掌握其活动信息和成员间相互联络的“黑话”。在国际上，与许多国家合作，互通情报，切断财路，打击洗钱，引渡罪犯。毋庸置疑，政府有时对恐怖活动做出过度的反应（如乱抓乱捕，刑讯逼供等）而引发暴力加剧和舆论批评。但总的说来，政府行为留有余地，对犯罪嫌疑人抓得多，判得少，处死更少；对确有悔改者，允许其家属探监，同意他本人回家奔丧、在狱中结婚生子、报考函授大学，等等。

兄弟会吸取了历史上 3 次被镇压的教训，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之交，即放弃暴力，改为用“宣教和训诫”等和平手段来唤起穆斯林的觉醒，蓄意通过竞选进入议会和市民组织，使国家向真正的伊斯兰社会演变，声称和平演变胜过武装圣战。

兄弟会是一个宗教、政治、社会组织，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较为坚实的群众基础，其实力大于现存众多反对党的总和。政府深知：如果把它和极端组织等量齐观，将增强极端组织的势力，于反恐不利；倘若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准许它自由参加竞选，将危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一党独大地位。政府处于两难的抉择，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对兄弟会采取既安抚又限制的方针。即一方面答应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公开活动，享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能以其他政党或独立人士的名义参加各级议会、同业公会和学生会的竞选，把它纳入官方政治系统，让它参与政治，并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希求；另一方面又凭借《政党组织法》，以兄弟会属于宗教组织为由，无数次拒绝它要求审议其合法性的诉讼和建党申请，使之在法律上始终处于非法地位，无法获得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从而不可能构成对官方政治系统“超负荷”的压力，威胁政治系统的稳定。此外，政府制定这一方针旨在拉拢兄弟会，孤立极端组织，欲通过兄弟会的言传身教来感化极端分子，以达到分化瓦解极端势力的目的。

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明智的，取得了预期效果。

拨乱反正，弘扬伊斯兰教的真谛

以伊斯兰教为名的恐怖主义，其一大特点是利用社会上的种种弊端，对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特别是经、训做出极端和片面的诠释，使之偏离正道，服务于极端组织的政治目的。诠释者以谄熟教义和教

法的“宗教学者”面目出现，惯于引经据典，对一些因不满现实生活而深感沮丧和失望、又缺乏必要宗教知识的青年有很大的迷惑性。

政府知道极端思想的存在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遂开动宣传机器，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各界人士批驳歪曲教义的种种谬论，讨论何谓伊斯兰教的真谛，痛斥极端组织热衷于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有悖于伊斯兰教教义的罪恶行径，用在暴力活动中无辜百姓丧命的事实揭露极端组织的残暴性和虚伪性。

穆巴拉克总统自 1986 年起再三表明：“恐怖分子是在利用伊斯兰教，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根本不懂得伊斯兰教，其中有的人从不礼拜。而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不提倡暴力，而是鼓励爱和合作”¹。由于圣战已成为极端组织成员从事恐怖活动的原动力，还由于世上一些人对伊斯兰教、圣战和恐怖主义三者的关系缺乏了解，爱资哈尔教长反复申明，圣战与恐怖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其涵义和目标迥然不同。伊斯兰教是宽厚、仁慈、和平的宗教，它训示信徒不要伤害没有伤害过他们的人，应向在他们土地上定居、与他们以邻居为伴的人提供安全。恐怖主义则肆意伤害他人，这无论就宗教和现世而言，不啻是一大灾难，伊斯兰教对此是无辜的。因为伊斯兰教限定圣战仅为了两件事：其一，捍卫自己的生命、财产、信仰和祖国；其二，支持受压迫者。除此以外，均为非法。

爱资哈尔教长在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享有崇高威望，他们发布的“法特瓦”对广大穆斯林明辨是非、弃恶扬善起到了引领作用。然而对于极端组织成员来说未必如此，在他们眼里，教长和国家穆夫提是官方代言人。

兄弟会总训导师哈桑·胡代比（1951~1976 年在任）在著作中逐条驳斥了库特卜的极端思想，断定“统治权归真主所有”的信条未见诸于经、训，不足为信；随意指控穆斯林个人和社会为“蒙昧主义”，是篡改了圣训；因愚昧无知而触犯教法，情有可原，“我们不能指控他人为叛教徒，除非此人的叛教行径已为教法所确认”^④。兄弟会发表声明，谴责国内发生的恐怖事件。总训导师欧默尔·泰勒迈萨尼（1976~1986 年在任）还应邀到狱中劝在押的恐怖分子远离极端，摒弃暴力。兄弟会和极端组织本是同根生，早先的极端组织是从兄弟会分离出去的，相互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兄弟会的言行在部分极端组织成员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感化作用不可小觑。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伊斯兰思潮在阿拉伯世界蔚然成风。在官方伊斯兰和民间的相互作用下，全社会的伊斯兰色彩大增，希冀实施伊斯兰教法和强化伊斯兰道德教育的呼声高涨。埃及也不例外，1971 年永久宪法、1980 年宪法修正案分别规定伊斯兰教法是“立法的源泉之一”和“立法的主要源泉”。人们热望从传统宗教文化中谋求治国方略和发展之道。阿拉伯国家面临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是现代国家能否将伊斯兰教作为统治制度；二是伊斯兰统治制度是否是阿拉伯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在埃及，尽管实行了多党制，开放了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但在争论宗教问题上的自由度却大幅下降，有人说，远不如二三十年代，此话决非过甚其词。1981 年萨达特被枪杀^④、1992 年著名作家法尔吉·富戴被暗杀^{1/4}和 1997 年开罗大学副教授纳斯尔·阿布·宰德被宣判为叛教者^{1/2}，这几件事使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颇为压抑。诚然，埃及在政治生活中奉行政教分离政策，但自

¹ 埃及新闻部新闻总署：《穆巴拉克反对国际恐怖主义（1986~2001 年）》，中文版，第 25 页。

^④ 哈桑·胡代比：《我们是布道士，不是判官》，开罗 1987 年版，第 246 页。

^④ 萨达特被枪杀的原因众多，其中之一是，1980 年他说了一句名言：“在政治中没有宗教，在宗教中没有政治”，招致杀身之祸。

^{1/4} 埃及知名世俗主义作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勇敢地站在反对伊斯兰主义思潮的第一线，与伊斯兰主义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遇难后，一些宗教学者仍顽固地指控他亵渎神明，反对教法，死有余辜。

^{1/2} 时任开罗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他在申报晋升教授的专著中提出“经文历史性论”，即一些经文因时过境迁已失去其历史意义，如蓄奴和释奴等。1995 年由 20 名爱资哈尔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认为这一论点大逆不道，责令他当众忏悔。1997 年又宣判他为叛教者。根据教法，他妻子应和他离婚。夫妻俩不甘屈服，移居他国。2002 年 8 月爱资哈尔研究会发布教喻，取消宣判他为叛教者的决定，但仍要他悔罪求恕。

萨达特之后政要们出于政治、思想等因素考虑，不便或不愿公开宣布实施这一方针。幸好，有各种思潮代表人物参加的对话会、座谈会层出不穷。一些世俗主义作家、思想家和学者秉笔直书或坦率直言，道出了一些政要们的心声。著名作家优素夫·伊德里斯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理直气壮地说：“不行，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科技和欧洲（政治）制度之上。不能巩固伊斯兰统治制度，把它强加于现代社会”。关于第二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不，不是必经阶段，我们注定要向前迈进的”。¹

埃及政府和各界人士在舆论导向上所作的种种努力，不可能在短期内立竿见影，但年深月久，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铲除恐怖主义的社会根源

1952年7月23日革命后，埃及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1974年起政府改变发展模式，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使埃及社会处于各种矛盾凸显的转型期。从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转型期，社会发生动荡，不足为奇。现代化与社会稳定不是成正相关关系，正如亨廷顿所说：“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④。这一通则，埃及未能幸免。在奉行开放政策后，埃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对峙，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率陡然上升，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惊人，社会价值观被扭曲，等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国内恐怖主义日趋猖獗。但各个时期诱发恐怖活动的因素不尽相同。20世纪70~80年代极端组织成员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出生在农村，毕业后在城市边缘区生活。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参与或策划恐怖活动是在急速转型期不同政治文化观念撞击下，受极端思想的影响所致。到了90年代极端组织成员在结构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大多是居住在农村、小城镇和大城市棚户区穷困潦倒的小青年，他们走上极端道路最初是生活贫困使然。

不管怎样，贫困和社会不公是社会陷入动乱的社会根源。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早已探明：“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能在不公平中找到叛乱的原因。”^⑤穆巴拉克政权懂得要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办法是认真改革，发展经济，尽快摆脱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三高一低”（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率、高额外债和低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危机，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1991年埃及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了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双方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并无异议，分歧点在取消价格补贴、实现埃镑浮动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速度和程度上。政府力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要求和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承受力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设法在一些关乎广大人民切身利益问题上尽可能协调、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中改革初见成效，到90年代末改革已开花结果。经济增长由1986~1990年年均2.5%上升到1991~1998年年均近4.4%，财政赤字由80年代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下降到1999年的1%，通货膨胀率由七八十年代的25%~30%回落到1999年的3%，外债由1990年的500亿美元减少到1999年的282亿美元^{1/4}，人均国民收入由1980年的400美元增至1999年的1410美元^{1/5}。埃及由低收入国家跃入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20多年间，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开放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无疑是商人和部分官员。政府在维护这些人利益的同时，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对包括工薪阶层在内的有限收入者在一定范围内给予适当照顾，以保持社会稳定。采取的措施有：（1）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凭本供应制，对一

¹ 卢克·帕布勒斯库、菲利普·卡尔迪纳勒：《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意见》，阿拉伯文译本，开罗1990年版，第99页。

^④ 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

^⑤ 邓伟志等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1/4} 埃及新闻部新闻总署：《2000年埃及年鉴》，中文版，第65页。

^{1/5} 埃及新闻部新闻总署：《1999年埃及年鉴》，中文版，第59页。

些生活必需品进行价格补贴。到 2001 年享受这一优惠的人数仍达 4 230 万¹，占全国人口的 62%。供应品种最多时有 15 种，最少时 2 种，目前为 8 种。(2) 坚持各级教育免费制。这一制度始于纳赛尔时代，1971 年被载入宪法，目的是使穷人上得起学，促进社会流动。不仅大中小学教育实行全部免费，而且有幸住进大学城的学生每月只象征性地缴纳一点食宿费。1990~1991 财年至 1998~1999 财年间教育费用平均占国内总产值的 5%^④。(3) 在私有化进程中关注员工的利益，把小企业优先卖给职工，不得随意要员工下岗失业，损害他们的福利待遇，安排下岗失业人员参加职业培训，提前退休者可获得一次性补偿 1.5 万~3 万埃镑。(4) 扩大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定所有国有和私有企业的员工必须参加社会保险，到 2000 年 7 月投保人数多达 1 745.3 万人，占当年就业总人数的 92.7%^④。国家继续推行公费医疗制，到 2003 年受惠人数超过 3 500 万。(5) 设法缓解失业压力。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失业率逐年攀升。政府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出国谋生，将部分新开垦的农田以优惠价卖给大中学校毕业生；社会发展基金和纳赛尔银行提供小额低息贷款，帮助青年自谋生路；本世纪初还组织待业青年进行职业培训；恢复 80 年代被停止执行的大中学校毕业生生统一分配制度。

且不论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今天，埃及政府继续执行上述某些政策是否明智，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即政府在发展国民经济时注意减轻和克服传统发展战略的种种弊端，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贫困户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60% 降至 2001 年的 22.9%^{1/4}，衡量社会公正的基尼系数由 1991 年的 0.3 降到 1995 年的 0.289^{1/2}。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努力，埃及的贫困和社会不公问题已得到缓解。但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缓慢，远低于满足新增劳动力就业要求的 6% 的增长速度，更不待言安排长期失业人员的工作。失业率又回升到 10% 上下，大学和中学毕业生的失业情况十分严重，近期内无望解决。挣扎求存的贫困人口尚有 1 000 多万人。全国棚户区面积约 344 平方公里，居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4。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任重而道远。

杜绝隐患，发扬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埃及约有 10 万座清真寺。它不仅是祈祷和布道的场所，而且是读书识字、学习经文的学堂。新建的大清真寺设施完善，内设图书馆、会议室、诊所、强化训练班、电脑室，等等，属非赢利机构。埃及笃信逊尼派，没有教阶。由于历史的原因，爱资哈尔教长被公认为最高宗教领袖。伊斯兰教自创立之日起，便与政治关系密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社团的世俗化倾向有增无已。阿訇、宣教师在平时和主麻日讲经时联系国内外实际已成定式。

清真寺有大小之分。大清真寺大多归国家宗教基金部管辖。小清真寺又称简易清真寺。1972 年议会曾通过法案，规定凡建造祈祷场所须经有关部门批准。遗憾的是这一法令未能付诸实施，致使 90% 以上的小清真寺和少数规模较大的清真寺为民间所有。其中一部分为伊斯兰主义者所有或把持，成了传播兄弟会宗旨和极端思想、培养和吸纳青年、策划和组织合法或非法活动的庇护所。一些人身披宗教外衣，散播异端邪说，夸大渲染社会弊端，煽动民众憎恨现政权。他们的讲话被制成录音带，四处兜售，流毒甚广。政府决心将所有民办清真寺收归宗教基金部，以消除一大隐患。迄今为止宗教基金部已控制全国大小清真寺 9.25 万座，2005~2006 财年计划再收回 4 500 座民间清真寺。宗教基金部负责选派合格的阿訇和宣教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登上清真寺讲坛布道说教。

九一一事件后，穆巴拉克总统不失时机地提出“发展宗教演讲”的号召。他深切地感到目前的宗

¹ [埃及]《金字塔报》，2002 年 5 月 11 日。

^④ 埃及国家计划研究所：《1998~1999 财年埃及人力资源发展报告》，开罗 2000 年版，第 76 页。

^④ 埃及新闻部新闻总署：《埃及十九年成就》，中文版，第 76 页。

^{1/4} 《金字塔报》，2001 年 7 月 19 日。

^{1/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1998 年版，第 68 页；2002 年版，第 74 页。

教演讲内容陈旧，需不断更新，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提高公民觉悟，纠正他们头脑中种种有损于伊斯兰教、阻碍国家发展的错误思想。宗教基金部知道：提高阿訇和宣教师的素质是发展宗教演讲的前提。2003 年该部部长对阿訇和宣教师提出了 3 点新要求：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关注现代科技发展，用开放的心态和完整的知识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吸取温和的现代宗教观，使群众深刻领会，自觉接受。为此，在各地开设培训营地，分期分批地对现有阿訇和宣教师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培训。同时一改过去选拔阿訇和宣教师的方式，选拔对象由爱资哈尔大学宗教学院毕业生扩大到师范学院，以及专事伊斯兰研究的语言和翻译学院毕业生，藉以改变他们的知识结构。宗教基金部经常与爱资哈尔清真寺协调制定宣教计划和纲领，就应对极端思想的策略交换意见。强调各清真寺应该把关心国家和民族紧迫问题放在首位，当前的宣教重点是反对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从伊斯兰教的观点讲解穆斯林与其他信徒的关系、自觉节制生育、吸毒、环保、扫盲、女孩辍学等问题。

宗教基金部还制定了加强民众宗教觉悟计划。各省成立了以省长为首的宗教觉悟委员会，以保证该计划的贯彻实施。派遣由著名宗教学者、思想家和宣教师组成的宗教宣讲团到大中学校、保安部队、工厂企业、青年中心、夏令营、俱乐部、文化中心、监狱，以及边远的乡村去讲解伊斯兰教的正确教义，以及人们所关心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社会问题。

埃及政府从更深层次来阻遏极端思想的渗入，下令重新审定中小学宗教教科书。教育部长指出，教科书除包括宗教礼仪和祈祷外，重点在人际交往和道德方面。一些不合适的内容已被删除。爱资哈尔大学宗教学院也修订了教学大纲，强调学生必须接受正确的伊斯兰教宗教遗产教育，免受不良思想的侵袭。教育部还改组了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在一些省份创办的伊斯兰学校，特别是西部省的所谓“穆斯林一代学校”，任命一批新的校长和教员，规定任何人不得取消或更改教育部审定的宗教教科书。

凡此种种，使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纽带和法律、道德的辅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统一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加强人民团结的作用。

由于埃及政府采取了这些标本兼治的对策，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伊斯兰主义的“武装圣战”思想越来越不得人心，大批无辜百姓死于非命的悲惨情景使广大人民对暴力活动深恶痛绝，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日见减少。极端组织在军队的全力围剿下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极端组织成员、支持者和同情者被捕。在此情况下，20 世纪 90 年代埃及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集团被关押在狱中的创始人和协商会议委员于 1997 年 7 月 5 日宣布，单方面无条件地停止国内外一切反对国家的军事行动，停止发表一切煽动反对国家的声明。据称，这一决定得到在美国狱中服刑的精神领袖欧默尔·阿卜杜·拉赫曼的支持。2002 年 6 月凯尔姆·祖赫迪等领导人拟定了致埃及人民的道歉信，对他们在过去 20 年内犯下的种种罪行表示歉意。他们还宣布解散伊斯兰集团的军事组织；对境内外一些伊斯兰集团成员于 1997 年 11 月策划制造的卢克索事件加以谴责；拒绝加入圣战集团和本·拉登拼凑的世界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伊斯兰圣战阵线。在当局的安排下，这些领导人在狱中与被关押的一些骨干和普通成员会面，劝说他们接受停止暴力活动的决定。2003 年他们将会面的内容写成书，取名为《回忆的长河》。在书中，他们供认，由于伊斯兰集团的暴力活动，“埃及社会各阶层人民——我们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曾过着严峻的日子，在伊斯兰民族面临伟大事业、特别是巴勒斯坦的共同敌人时，（埃及国内）却血流成河，精力分散和四分五裂”。正是这长达多年的痛苦实践促使他们改弦易辙，放弃暴力¹。伊斯兰集团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转变，虽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放弃暴力，改为从事和平合法的活动已大势所趋，为多数领导和成员所认同。

伊斯兰集团的转变如同一声惊雷，使另一个最大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圣战集团内部分裂。2000 年 2 月 5 日在德国避难的领导人乌沙曼·艾尤布号召其战友停止在埃及的军事行动，积聚力量，解放耶路撒冷。当年，包括奈比勒·马格里比在内的 12 名被关押的领导人表示支持。但在狱中和国外的许

¹ [沙特阿拉伯]《中东日报》，2003 年 10 月 4 日。

多领导人特别是艾曼·扎瓦希里坚决反对。他们通过圣战集团在海外发行的喉舌《战士报》指示其成员恢复军事行动, 拒绝和平方针, 讹称一些人发表停止暴力声明是受压力所致。不久, 奈比勒·马格里比反驳道, 他们是经过多年研究自愿做出主动停止暴力决定的。圣战集团前领袖阿布德·祖姆莱正在狱中和一些领导人进行如同伊斯兰集团那样的反思。埃及伊斯兰运动事务专家孟台绥勒·宰亚特认为, 安全部队已铲除圣战集团的基础。该组织已迁往国外, 与“基地”组织结盟¹。

埃及政府对伊斯兰集团的转变和圣战集团内部微妙的变化持谨慎的鼓励态度, 并做出一定的回应: 改善狱中的生活条件, 废除鞭刑, 停止大批抓人, 释放了几千名一般成员、支持者和同情者, 以及个别刑期已满的领导人。同时, 政府继续在国内外追捕逃犯, 将在国外落网的罪犯引渡回国受审, 将企图恢复一切极端组织活动的嫌疑犯捉拿归案。2003 年 10 月当局在相信伊斯兰集团确有改邪归正之心后, 下令释放了包括其头领凯尔姆·祖赫迪在内的近千名成员。

尽管恐怖活动在埃及尚未完全平息, 如 1997 年 11 月 27 日发生了卢克索惨案 (58 名外国游客和 4 名埃及人丧生), 但总的说来, 埃及国内安全局势经过 1/4 世纪的腥风血雨后已明显好转。正如 2001 年初内政部长哈比卜·易卜拉欣·阿德利少将所说, 恐怖活动已大大减少, 埃及局势平静, 但不能忽视一些恐怖源头进行的活动, 应提高警惕^④。

2004 年 10 月、2005 年 4 月和 7 月在塔巴、开罗和沙姆沙伊赫相继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四)。这些事件均属自发性的团伙行动。它们人数不多, 来无踪, 去无影, 难以捕捉。它们与国内外恐怖组织没有联系, 自觉地认同于武装圣战思想, 有的甘愿采取自杀性行动来为“主道而奋斗”。它们的行动诡秘, 制造的突发事件难以预料, 从而使反恐斗争变得异常复杂和艰难。它们袭击的对象主要是以色列和美国等外国游客, 企图借此向杀害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复仇。但沙姆沙伊赫事件的矛头是指向现政权的, 藉以诋毁它的政治声誉, 破坏国家的旅游业, 使人民怀疑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宁和稳定方面的能力。其实, 这伙肇事者的举动是十分愚蠢的。在长期饱尝恐怖主义之苦的埃及, 用汽车炸弹或人体炸弹杀害大批无辜平民和外来游客只会激起广大民众的无比愤恨, 对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恐怖主义者来说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 将使他们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埃及各界人民痛斥这类暴行, 并自发地组织反恐示威游行; 兄弟会、伊斯兰集团和在狱中的圣战集团领导人也发表声明, 加以谴责, 便是明证。另一方面, 这些事件又说明埃及国内极端思想的源头尚未堵住: 众多的伊斯兰主义者仍以学者、长老、教授等身份在社会上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活动; 库特卜之流的著作、录音带在书店里和清真寺旁堂而皇之地出售; 兄弟会的报刊杂志和书籍照常发行。埃及所在的中东地区是当代以伊斯兰教为名的种种极端思想和恐怖活动的主要中心, 这些思想和活动通过媒体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传入埃及, 不可能不在当地极少数人心中产生共鸣和回应。特别是以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为首的“基地”组织对坚持反恐的穆巴拉克政权恨之入骨, 把它诬为“美国人的走卒”, 千方百计地进行诽谤和渗透。在此情况下, 埃及欲独自在国内肃清极端思想是不可能的。再者, 埃及政府的某些做法也似有欠周到之处。政府对一些青年在兄弟会的煽动下举行的抗议政府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

¹ 穆哈默德·加麦尔·阿拉法特:《开罗爆炸与第三代恐怖集团的兴起》。www. islamonline. com, April 11, 2005.

^④ [埃及]《金字塔报》, 2001 年 1 月 27 日。

^(四) 2004 年 10 月 7 日晚在塔巴发生了主要针对以色列游客的 3 起连环爆炸, 造成 35 人死亡, 159 人受伤, 其中以以色列游客死 10 人, 伤 124 人。肇事者有 7 人, 为首的是一名定居阿里什的巴勒斯坦人, 其余是西奈半岛的贝都因人。其中 4 人在肇事中身亡或被击毙, 2 人被抓, 1 人在逃。2005 年 4 月 7 日 1 名青年在 4 名同伙 (其中 3 人已被捕, 1 人在逃) 的策动下, 在开罗老城区向外国游客引爆了自制的爆炸物, 造成 3 人死亡, 16 人受伤, 其中外国游客死 2 人, 伤 8 人。肇事者当场死亡。未隔多久 (4 月 30 日), 上一事件在逃的罪犯伙同其妹妹和女友又在开罗制造了两起针对外国游客的自杀性爆炸事件, 导致 7 人受伤, 其中 4 人是外国游客。3 名肇事者当场死亡。当年 7 月 23 日在沙姆沙伊赫发生了 3 起连环爆炸, 导致 64 人死亡, 124 人受伤, 其中外国游客死 7 人, 伤 20 人。据悉, 策划这起事件的元凶是一名牙医, 他发展了 10 人, 组成一个恐怖主义团伙。这伙人大多属西奈北部的贝都因人, 也包括塔巴事件的首犯那样的祖籍为巴勒斯坦的人。他们先后制造了塔巴事件和沙姆沙伊赫事件。这伙人大多已自杀身亡, 或被击毙, 或被捕。纳吉夫总理称, 没有证据证明 2004 年和 2005 年在西奈发生的爆炸案与外界组织有关。

问题上态度“软弱”，要求允许本国志愿人员出国参战的游行示威，满足于将它们围堵在校园内，一旦冲出校园，便派军警抓捕，而不是因势利导，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开诚布公地阐明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因此，国家的“声音低于那些煽动革命和圣战，反对美国 and 以它为首的西方及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的作品声音”¹。其结果是一些青年反犹、反美的情绪日益加剧，而且反过来对政府不满。这种憎恨和不满情绪为极端思想的侵入留下了空隙，容易形成若干个葡萄串似的所谓“沉睡的细胞”。一旦国内、本地区或国际上发生重大事件，这些“沉睡的细胞”有的就会“苏醒”，卷入或策划恐怖活动。正因如此，埃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再度发生孤立和突发的恐怖事件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恐怖事件很有可能演变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恐怖主义，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发展成上世纪最后 1/4 世纪那样规模大、频率高、打击面广的恐怖主义。

尽管如此，埃及在反恐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应归功于埃及政府正确的对策和各界人士长期艰辛的努力。面临严峻反恐形势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从埃及反恐经历中可吸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艾哈迈德·纳吉·盖姆哈：《哈奈·赫利利事件的起因和后果》，载埃及金字塔报社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网站 (<http://acpss.Ahram.org.eg>)，2005 年 4 月 11 日。

• 学术动态 •

中东形势研讨会纪要

田文林* 陈双庆**

*** 2005 年 8 月 5 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主办了“中东形势研讨会”，来自国内十几个单位的近 30 名代表与会。他们就下列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关于伊拉克战争后中东格局，与会学者认为，中东地区格局有一些新变化：(1) 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困境；(2) 巴以、黎巴嫩等热点问题更加突出；(3) 中东“民主改造”进程不但未按照美国的愿望进行，甚至是背道而驰，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中激起了更强烈的反美情绪。但总体看，目前中东局势趋于缓和，再度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关于美国在中东的处境，与会学者的观点有明显分歧。其一，当前美国在中东的优越地位日益明显。其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得失参半。其三，美国在中东已陷入困境。美国在中东“赢得战争却失掉和平”，它有能力推动对中东战略，但难以解决在中东面临的复杂问题，陷入一种“输不起、但又欲罢不能”的处境。关于伊拉克重建，与会学者认为，伊拉克的基础设施虽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伊拉克的经济仍占据重要地位。伊拉克重建对中国机遇与风险并存。机遇是：中伊经过多年交往，两国关系有互信与合作的基础。伊拉克看好中国

的大国地位，这为中国进入伊拉克重建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风险是：第一，美英控制了伊拉克重建中东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国与之竞争的市场风险很大，第二，伊拉克过渡政府执政基础不牢，政治和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关于伊朗核问题发展趋势，与会学者认为，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伊双方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此外，伊朗是美国整顿中东秩序的最大障碍，压缩伊朗生存空间是既定目标；而不放弃核研发则是伊朗既定政策。与会学者还普遍认为目前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不大。关于中国在中东的处境，与会学者认为，中东对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总体来看，中东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的发展有利。

(责任编辑：吴传华 责任校对：樊小红)

* 本文作者田文林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

** 本文作者陈双庆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Amelioration of Iran– Iraq Relations and the Prospects

Zhong Dong

pp. 10– 14

On July 16th 2005, Iraqi Prime Minister Ibrahim al– Jaafari leading a large delegation visited Iran, which can be said a landmark diplomatic action to improve bilateral relations. Fundamentally speaking, amelioration of Iraq– Iran relations consists in agreements in state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be specific, congenetic religion and culture are resources for

identification;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and 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is the requirement of state interest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re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s. Presently, Iraq – Iran security cooperative mechanism is at an early stage and far from perfection, but a loose security framework restricted by varied external factor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ost– war Iraq

Liu Yueqin

pp. 15– 20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ost– war Iraq centers on three aspects: to restore state sovereignty, to execute federalism and to establish democracy. The key idea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to oppose occupation, uphold sovereignty and establish a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Sovereignty is the guarante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absences of intention of withdraw of the U. S. army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 status of occupation delayed restoration of Iraq's whole sovereignty for an unlimited period. Several difficulties occur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federalism and democracy. The factor

to separation lurked i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in which power allocation is along the ethnic and religious lines. The ethnicity and religious sect consciousness are strengthened, which become the principles for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However, the weakening of national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ugments the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divisions. It is incontestable that U. S. has difficulty pushing democracy in Iraq, and many obstacles foretell its unpromising future. Nevertheles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success of the Iraqi democracy promoted by outside forces cannot be excluded.

Policies of the Mubarak Government towards Domestic Terrorism

Yang Haocheng

pp. 26– 33

Since the 1970s, Egypt has suffered a lot from terrorism. Taking a guideline for dealing with terrorism by looking into both its root cause and symptoms, the Mubarak government make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extremist forces, mobilizes the mass media to refute the extreme thoughts, eliminates poverty and social injustice, puts an end to hidden troubles and enhances the positive roles of religion in society. From 1997 onwards, the domestic security

situations have turned the corner and remained calm. Several isolated group– committed bombings in recent years indicate that domestic extremist thought isn't eradicated yet.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is kind of terrorist activity will turn into organized terrorism with a guideline. However,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t is unlikely to evolve into terrorism on large scale, in high frequency and with broad targets to attack like that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past century.